

为三国魏延一辩

周学禹

魏延,字文长,义阳(今河南省信阳)人,为三国时蜀国大将。他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多谋善断,智勇双全。他金戈铁马,南征北战,战功赫赫,为蜀国立下不朽的功绩,然而《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竟让他背负着“谋反”的恶名;神机妙算的诸葛亮硬说他“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这的确是一桩冤案,为世人所不平!鲁迅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略·元明传来之讲史》中谈到《三国演义》时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丰厚而似伪,状诸葛亮的多智而近妖。”我认为鲁迅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近年来,不少研究《三国演义》的学者指出:不看到《三国演义》的优点,是民族虚无主义;但不指出它写人方面“亦颇有失”,也不利于借鉴古典小说,来创作新的历史小说。这种辩证说法,也是有道理的。

积于上述原因,笔者不揣谫陋,愿为魏延一辩。

魏延仰慕仁义,爱憎分明,在刘备危难败北之际投奔于他,不是追名逐利之辈,决不会有背叛谋反之心。试看魏延的首次出场。在小说《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下引此书只写回数):“刘玄德携民渡江,赵子龙单骑救主。”当时,刘备在曹操大军追迫之下,带领新野樊城两县百姓,扶老携幼,滚滚渡江,来到襄阳东门城下,打算进城与刘琮并力抵抗曹操,但刘琮惧而不出,他的部下蔡瑁,张允径来敌楼上,叱军士乱箭射下。城外百姓,皆望敌楼而哭。在此危难之际,“城中忽有一将,引数百人径上城楼,大喝:‘蔡瑁、张允卖国之贼刘使君乃仁德之人,今为救民而来投,何得相拒。’众视其人,身长八尺,面如重枣,乃义阳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长。当下魏延抡刀砍死守门将士,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大叫刘皇叔快领兵入城,共杀卖国之贼!”由于刘备惧怕惊扰百姓,不愿入城,便带领百姓,望江陵去了。刘琮部下不服,与魏延交战,从巳至未,延手下兵卒,皆已折尽,延乃拨马而逃,却寻不见玄德,自投长沙太守韩玄去了。

根据上述情节的描写,魏延一出场,便显示了他是非分明、见义勇为的性格。魏延的首次出场,说明了以下三点:其一,他认为刘备乃仁德之人,在其危难之际,不应拒而不纳,见危不救,这表明魏延富有仁人之心。其二,魏延认为刘备为救民来投,并无他念,不应相拒,这表现了魏延的爱民思想。其三,魏延在逃离襄阳后,仍去寻找刘备,只因寻找不见,

才自投长沙太守韩玄去了。这一点也体现了魏延一开始就决心跟定刘备，事后不会再有谋反之心。

再看魏延的第二次出场。在赤壁之战以后，当时，刘备据有荆襄，但四面受敌，立足不稳。关羽自请攻取长沙，以屏障荆襄。在攻取长沙、关羽与黄忠的作战中，黄忠马失前蹄，关羽卖个人情，没杀害他。次日，黄忠箭射盔缨，以报不杀之恩。长沙太守韩玄因黄忠不肯射杀关羽，喝令左右将他斩首。在这个关键时刻，魏延挺身而出，挥刀杀入，砍死刀手，救起黄忠。并大叫曰：“黄汉升（黄忠，字汉升）乃长沙之保障，韩玄残暴不仁，轻贤重色，今杀汉升，是杀长沙百姓也”（第五十三回）。接着“魏延直杀上城头，一刀砍韩玄为两段，提头上马，引百姓出城，投拜云长”（第五十三回）。这是魏延的第二次出场，当即刘备集团立下了战功，铲除了“轻于杀戮、众皆恶之”的韩玄，救了黄忠，也拯救了长沙百姓。然而魏延立功之日，便是他受诬害之时。当关羽引魏延来见孔明时，孔明喝令刀斧手推下斩之，若不是刘备说情，险些丧了性命。孔明将他处斩的理由是他“不忠”、“不义”“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第五十回）

先就诸葛亮斥魏延之“不忠”、“不义”来说，三国时代，群雄并起，都在延揽人才，以建霸业；都希望四方豪杰前来归附自己，以增强实力。刘备乃仁德之君，宽厚爱人；韩玄“残暴不仁”，“轻于杀戮”，“众皆恶之”。魏延杀韩玄，是为民除害，顺乎民心，何得谓之“不忠”；况且，天下分崩，英雄择主而事，理所当然，魏延之杀韩玄，投刘备，是弃暗投明，不得谓之“不义”，何况魏延在襄阳时，既已决心投奔刘备，只因赶刘备不着，才暂投韩玄的，安得谓其“不忠”、“不义”耶？退一步讲，如果说魏延杀韩玄、献长沙为“不忠、不义”，那么，仅就蜀汉来说，不忠不义之人正多。法正食刘璋之禄，居益州之地然而却为刘备出谋划策，夺取益州，法正之罪岂不是比魏延大得多吗？然而，刘备却非常信任法正，依为谋主；刘备为汉中王后，又以法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法正死后，谥曰翼侯，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再如，老将严颜，为刘璋巴郡太守，巴郡陷落后，不仅自己投降了张飞，还做了张飞前部，招降沿途关隘四十五处，如果依照诸葛亮的说法，岂不该碎尸万段吗？再如，刘备攻取雒城时，刘璋部将张翼在城上砍杀刘璋，开门投降，其所作所为，正与魏延相似，岂不亦当处斩吗？另外，刘备取西蜀时，刘璋部将降者甚众，当时诸葛亮都一一表示欢迎，何以独独如此对待魏延呢？这样符合小说的艺术真实吗？

再就所谓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来讲，在征战杀伐的疆场上，将帅士卒均系全副武装，在关羽引魏延来见刘备时，并未有免胄来见的细节描写，诸葛亮何以能透过头盔看出魏延“脑后有反骨”呢？况且，岂可以相面之术定罪？

再说魏延受尽屈辱，险些丧命，若非魏延对刘备集团忠心耿耿，矢志不移，恐怕当时就离刘备而去了。以魏延之才，或投吴，或投魏，位不失将帅，又何必在此备受屈辱呢！然而魏延计不出此，足见其真诚地忠于蜀汉，而无背反之心。

二

魏延投奔刘备集团之际，正是刘备集团建国立业与魏、吴鼎足而立的发展阶段，也可以

说是刘备集团势单力薄，困顿危难的时候，这件事的本身也说明了魏延不是趋炎附势、贪图利禄之辈，事后不会再朝秦暮楚背叛蜀汉的。事实是最好的鉴证，纵观在有关蜀汉兴亡的几次大战役中，魏延无不身先士卒，奋勇当前，取得累累战果。首先，以夺取西川之役来说，刘备令黄忠为前部，魏延为后军，出师西征。在攻取雒城时，黄、魏争功，各不相让，两人几乎要比试武艺。刘备急忙劝阻说：“吾今提兵取川，全仗二人之力，今两虎相斗必有一伤，须误了我的大事”（第六十二回）。取西川关系着蜀汉立国大计，如此重任，刘备却让黄忠、魏延二人承担，这说明两人勇毅相侔，地位同等重要。

其二，再说争夺汉中之役。在这次战役中，魏延表现得尤出色。当曹操兵出斜谷界口，前面一军相迎，为首大将乃魏延也。操招魏延归降，延大骂。操令庞德出战……延诈炊而走。操方麾军回战马超，自立于高阜处，看两军争战，忽一彪军撞至面前，大叫‘魏延在此！’拈弓搭箭，射中曹操，操翻身落马。延弃弓绰刀，骤马上山坡来杀曹操，操带伤归寨，原来被魏延射中人中，折却门牙两个”（第72回）。试看，魏延在战斗中，忽来忽去，忽伏忽现，神出鬼没，令人肃然起敬！在《三国演义》的大小千百次战斗中，直接伤及曹操者，魏延尚属第一人。魏延之忠于刘备，或者不次于“关云长挂印封金”吧！就此而言，可谓对魏延“必反”说的有力讽刺。

其三，关于南征孟获之役。南征，亦关系着蜀汉存亡大计，正如诸葛亮奏请后主所说：“臣观南蛮不服，实国之大患也”（第78回）。这次南征，共起兵五十万，声势浩大。诸葛亮命“赵云魏延为大将，总督军马，在大战中，又是魏延旗开得胜，第一个生擒活捉了孟获，立下了战功，他的功绩，较之赵云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四，说说北伐之役。诸葛亮北伐中原时，“五虎将”多已先后亡故，赵云年事已高，北伐重任自然落到魏延的肩上。因此，诸葛亮受诏出征，“唤诸将听令”，为首第一人乃“前都部——镇北将军、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都亭侯魏延”（第91回）。职务之多，责任之重仅次于诸葛亮。再如，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起三十万精兵，令魏延总督前部先锋……”（第97回）。更为难能可贵的、也是为后世军事家所赞扬的，当诸葛亮出师北伐，魏国派驸马夏侯楙率大军迎敌的时候，魏延向诸葛亮提出了大胆而正确的战略决策：“夏侯楙乃膏粱子弟，懦弱无谋。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夏侯楙若闻某骤至，必然弃城望横门邸阁而走。某却从东方而来，丞相可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第92回）。后世军家，在谈到魏延这一战略策略时，无不认为魏延之献策，确实是高瞻远瞩，从战略角度提出的难得的妙策。因为蜀国距离关中遥远，即使从汉中出兵，中隔秦岭，崇山连绵，道路险阻，易守难攻，粮饷难以为继，不宜作持久战。加之蜀国国力小，兵少将寡，亦不宜打消耗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陈仓暗渡”，出奇制胜，才可能夺取胜利。可惜诸葛亮却以“此非万全之计”而不采纳，仍从陇右取平坦大道，依法进兵，丧失了有利的战机，以至劳师数载而无大效，病死五丈原。当时诸葛亮如果采纳了魏延的这个妙策，北伐的形势，甚至三国的形势也许是另一种局面。仅此可知，魏延不仅有勇，仰亦有谋，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军事家了。

要言之，魏延投刘备之后，为蜀国奠基立业，开拓疆土，东战西讨，南征北伐，战功累累。尤其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王汉中后，魏延受封为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是年关

羽死于麦城，明年黄忠死。建安二十六年，张飞死。超亦死，后主继位后，赵云不久亦死。五虎将先后弃世，只剩下大将魏延了。此后他随诸葛亮继续北伐，斩王双，死张郃，大战司马懿，惊退夏侯霸……几乎无战不与，无战不克，出生入死，义无反顾，哪儿会叛反蜀国呢？

三

魏延是蜀国的一员大将，尤其在蜀国后期，在诸葛亮率领下，他血战沙场，勇猛过人，他多谋善断，智勇兼备，他英勇善战，向背分明。虽与五虎将相较，亦无逊色。

1、魏延与关羽。关羽“义贯千古”，威名赫赫，为后人所景仰。清人金圣叹在《圣叹外书》中，把关羽称之为“三绝”（关羽为“义绝”，诸葛亮为“智绝”，曹操为“奸绝”）之一。他说：“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这些评价，确实反映了关羽性格的某些真实。然而，在《三国演义》里，有不少地方也描写了关羽刚愎自用，骄傲自负、缺乏政治远见的一些缺点例如，在第73回中，东吴派诸葛瑾到荆州向关羽求亲，想以吴侯之子与关羽之女结为秦晋之好，并力破曹。从蜀国的利害关系来讲，这是件好事。因为联吴抗魏，可以造成鼎足三分之势，然后再图中原，这是诸葛亮制定的一个高明策略。然而，关羽缺乏政治远见，没有认识到它的重大战略意义，断然拒绝东吴的求亲，而且勃然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之面，立斩汝首”（第73回）。这真有点近乎辱骂之词了，亦欺孙权太甚了！正因为如此，蜀国被东吴夺去了荆州，关羽也丢掉了性命，死于麦城。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大举伐吴，终至造成猇亭惨败，使蜀国元气大丧，这较之魏延建议诸葛亮出兵子午谷，奇袭长安之策，则不可同年而语！此外，他不能团结傅士仁，糜芳，致使他们降吴；他结怨于孟达、刘封，为蜀汉造成一定损失；他听说马超归蜀，要入川与他比试；他听到自己和黄忠同被封为“五虎将，不愿受封，声言“大丈夫终不与老卒同列。”（《三国志·费诗传》凡此等等，都说明关羽见不及远，胸怀狭窄，有失大将风范。当然魏延也有不少缺点，但不若关羽之甚也。虽然如此，魏延的地位却远不如关羽显赫，而魏延终无怨色，诚可贵啊！

2、魏延与张飞。张飞勇冠三军，粗中有细，确实是蜀国一员虎将。长坂桥上喝退曹兵百万，勇则勇矣，然拆断桥梁，亦是其莽处。由于他莽，刘备有时不委之重任。例如，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王汉中，准备迁治成都，行前要派一员大将镇守汉中。汉中乃成都屏障，又是蜀国北伐基地，其地位至关重要，留镇者自然是智勇双全且能独当一面的大将。当时刘备手下的第一员大将关羽已经留镇荆州，大家都认为必然是张飞，张飞亦认为非己则莫属。不料刘备却选拔魏延为督都汉中的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全军大惊。这件事一方面说明刘备为开国之君，慧眼识英雄，另一方面也说明魏延之谋略与勇武不在张飞之下。

3、魏延与赵云。刘备尝说，“子龙一身都是胆。”实际上他不仅有胆而且有识。如，蜀国定都成都之后，时议欲以成都屋舍与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云力驳众议，认为国家未定，不可求安，应将田宅归还黎庶，令其安居复业，得其欢心，然后可役调。又如，刘备于关羽死后兴兵讨吴，赵云力谏曰：“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且先灭魏，则吴自服。”（《三

国志·赵云传》)凡此皆赵云卓识,忠心耿耿,英勇善战,为人所崇敬。不过赵云却是长期跟随在刘备、诸葛亮身边,很少独当一面,而魏延却常常军临战场的最前沿,或先锋,或为后部与敌人拚死厮杀。就两人的地位讲,据《三国志·魏延传》中记载,魏延为刘备“部曲”,属于近卫亲信将领。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魏延随刘备取西川,以屡建奇功,迁牙门将军。而此时赵云亦为牙门将军,二人品位相当。建兴五年诸葛亮大举北伐,以延为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而赵云则以镇东将军的身份,随诸葛亮驻汉中。显然,魏延这时已成为蜀国第一员大将,其地位、作用,亦不在赵云之下。

4、魏延与马超。马超亦蜀国五虎将之一,刘备说:“马超之勇,天下皆知,渭桥六战杀得曹操割须弃袍,几乎丧命,非等闲之比”(第六十五回)。曹操也说:马儿(指马超)不死,吾无葬身之地矣!”(第五十九回)这都说明马超是一员武艺超群的战将。魏延没有与马超直接对阵(只是在争夺葭萌关时,魏延被马超射中左臂),两人的武艺孰高孰低,尚难断言,也许马超胜过魏延一筹,但马超毕竟是有勇少谋,不知机密。因此,在《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渭口战役中,曹操就料定马超可以计破。虽然马超曾杀得曹操割须弃袍,但最后还是中了曹操离间计,致使马超与韩遂二人火拚,马超亦因此而惨败,投奔了张鲁。再如,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起兵东征伐吴,临行前命丞相诸葛亮保太子守两川,命骠骑将军马超并马岱助镇北将军魏延守汉中,以当魏兵。就这一点来讲,魏延在蜀国的地位当在马超之上,同时也可以间接证明,在谋略方面,魏延又胜过马超一筹。再就对蜀国的贡献方面,马超又不能与魏延比肩了!

5、魏延与黄忠。魏延与黄忠并起于一时,都是在关羽进攻长沙时归附刘备的。但黄忠是在长沙太守韩玄因其不肯射杀关羽而下令将他斩首的危机关头,魏延挺身而出,杀上城头一刀砍死韩玄,提头上马,引百姓出城,与黄忠一起投拜关羽的。这说明魏延是主动积极地归附刘备的,而黄忠确乎有点不得已而为之。在这个问题上,说明了魏延先于黄忠认识到刘备宽厚爱民,乃仁德之君;而韩玄乃残暴不仁、轻贤重色之徒,杀之以投拜刘备,是正义的。魏延是非分明,敢做敢为,在这一点上又是黄忠所不及的。再就二人对蜀国的勋劳上来讲,也难以分出上下,况且黄忠死后,魏延又为蜀国立下不少汉马功劳,为人所共知。然而,黄忠位列五虎将,且留下“忠勇老将”的美名,而魏延却以“脑后有反骨”,恶名昭著,为后人所不耻,岂不太冤枉!

上面的论述,目的在于说明魏延的勇毅和功勋并不次于“五虎将”。是否故意拔高了魏延的地位呢?否,请看第六十五回:刘璋投降刘备之后,刘备自领益州牧,对一班文武官员,尽皆升赏,定拟名爵:“……诸葛亮为军师,关云长为荡寇将军,汉寿亭侯;张飞为征虏将军,新亭侯;赵云为镇远将军;黄忠为征西将军;魏延杨武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这次拟定的名爵是按军功的先后顺序排定的。诸葛亮排在首位,自然名实相符,理所当然。关云长、张飞与刘备桃园三结义,并起于涿县,患难相扶,生死与共,除将军之外,加封侯爵,也是顺理成章的。其余赵云、黄忠、魏延、马超皆为将军,也是自然合理的。就此而论,蜀国应为“六虎将”。然而,魏延却被排除于“虎将”之外,难道不是有欠公允吗?虽然如此,而始终未见魏延有怨色,也是难得的啊!何反之有?

四

魏延忠于蜀国，沙场征战，出生入死，为蜀国战斗了二十多年，立下了赫赫战功。论才干，讲智勇，评战功，他都不在五虎将之下，尤其是五虎将先后谢世后，魏延成了蜀国硕果仅存的一员大将，还一直奔走疆场，杀敌立功，贯穿始终。然而，魏延没有死于杀敌立功的战场，而是在诸葛亮死后，在与丞相长史杨仪的火拼中失败而被杀的。杨仪，“性狷狭”，是个反复无常，争权夺利之辈。早先“为荆州刺史傅群主簿，背群而诣襄阳太守关羽，羽命为功曹，遣奉使西诣先主”（《三国志·杨仪传》），后拔为尚书，旋迁长史。诸葛亮死后自以为功大，当代亮秉政。他平日处事，在达不到自己目的时，便“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杨仪传》）后来终于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诸葛亮死后，他对费祎说：“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同上注）这是杨仪的自供状，标标准准的叛贼嘴脸。杨仪不仅“性狷狭”，且极其残暴，当（马岱）致（延）首于仪，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魏延传》）残戾之至，史所罕见。

事实证明，真正想叛反的确是杨仪，只是当时时机未到，后来又失却权力与机会罢了。而魏延，于诸葛亮死后，以振兴蜀汉为己任，力举继续北伐。他说：“丞相虽亡，吾自当率兵击贼，云何以一人之死，废天下之事耶！”（《魏延传》）魏延的这些话，丝毫没有表现他有背反之心，反而说明了他要继续“率诸军击贼”，不能因诸葛亮之死而中断北伐事业。另外诸葛亮去世后，论功勋，论地位，论威望，都应当由魏延统帅全军，支撑颓局，复兴蜀汉，现在却要他听从权欲薰心，一向与他为敌的杨仪的号令，他怎么能心服呢？正因为如此《三国演义》的作者虚构了魏延“背反”的故事情节：魏延收聚残军，与马岱商议曰：“我等降魏若何？”（第105回）以此来照应前面诸葛亮所说的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的意断。当然这也是作者为了用来衬托诸葛亮神机妙算的谋略。事实上陈寿在《三国志·魏延传》中已作了比较客观的结论：“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又说：“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试想，如果他要叛反，又何必撤退时抢在杨仪之前南返呢？他不是可以率领本部人马，在前线倒戈，投降曹魏吗？如果他要叛反，又何必一次次表奏杨仪造反呢？退一步讲，他也可以割据汉中，独立自主，观察时机，待机而动；或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军临成都城下，夺取蜀国政权，然后杀败杨仪一军，这也是可能的。然而，魏延都没有这样做，只是不愿受杨仪部勒，而要由他率军继续北伐，不要“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这种说法也是有道理的，怎么能说他要背叛蜀国呢？况且，反叛后主才算背反，何以反对无比残忍，争权夺利的杨仪竟称之为“反叛”呢？再者，诸葛亮临死前指定的继承人是蒋琬而非杨仪，杨仪以其不正当的手段，窃取权柄，违背丞相旨意，也应当把他铲除掉，何谓之“反”呢？

再如，魏延死前，姜维挑战，“延横刀勒马而言曰：‘伯约（姜维，字伯约）不干你事只教杨仪来’（第105回）。大家知道，“五丈原诸葛亮禳星”时，魏延飞步闯入军帐，报告魏兵至矣！”由于脚步急促，竟将主灯扑灭。为此，姜维曾经要杀魏延，此事延记忆犹新。魏延（下转88页）

这一阶段哈姆莱特在自信和谐的心理状态下完成了自己应该完成的复仇任务，他的行动是那么勇敢、果断，在死亡面前又是那样悠闲，令人叹惋。

纵观哈姆莱特性格发展的三个阶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哈姆莱特的心理浪潮是与外部行动紧密相连的。早期的和谐是同他天真幼稚分不开的。当和谐的内心被骚乱所代替以后，他在进行一系列的反抗斗争中，思想也逐渐变得成熟起来。当复仇在望的时刻，他心理的和谐又重新回来了，不失时机地完成了自己的复仇任务。在外部上，哈姆莱特表现在进行一系列的复仇斗争；在心灵发展上，他是在追求一种内心世界的和谐完美。这也符合莎士比亚本人对美的追求。莎士比亚在创作中对无秩序、暴力进行了无情地抨击，对和谐宁静给予了赞美，从某种意义上说哈姆莱特的内心追求也正代表了莎士比亚的美学观念。这也许是莎士比亚的匠心所在。

注：

①托玛斯·汉莫的观点，

②A·史雷格尔：《戏剧艺术与文学讲座》、2（1811），

③萨拉瓦多·德·玛边雷文：《论〈哈姆莱特〉》，1948，

（上接50页）果真要“反”，此时不正是报仇的良机吗？正因为他不“反”，只是要杀杨仪，所以才不与姜维交战，又何得谓之“反”耶？

再一点，据《三国志·魏延传》第1004页注〔一〕云：“《魏略》曰：诸葛病，谓延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令延摄行已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之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臣松之以为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这段注释，附于《魏延传》“不便背叛”之下，把“不便背叛”的事实说得何等详尽，虽然最后两句，裴松之以为系敌国传闻，“不得与本传争审”，但本传中亦未有魏延“背叛”之记载呀！以此亦可佐证魏延之不“反”也。倒是杨仪违背丞相遗旨，杀害了魏延并捏造“延欲当众北附”的谎言，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魏延诚心归附刘备，但是从一开始就受到诸葛亮的呵斥，险些被杀。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里，也常常受到诸葛亮的歧视，遇到种种不平。但他始终忠心耿耿，效命疆场，为国杀敌。除了他建议出兵子午谷，奇袭曹魏，夺取长安之策未被采纳时，情绪有不满之外，很少听到他有什么牢骚，更没有进行过煽惑，对于一个战功赫赫的武将来说，这也是很难得的啊！

诸葛亮死后，魏延被迫斩，这是魏延个人的悲剧，也可以说成是蜀国的悲剧，如果魏延代诸葛亮而为丞相，蜀国后来发展的形势，也许是另一种局面，退一步讲，或者不至速亡吧。